

K826.2

20

:2

中国现代名医传

二

主编：黄树则

副主编：陈海峰 蓝思聪

科学普及出版社

B

487410

编 者 的 话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堪称世界一大宝藏；而各科名医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为了表彰我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事业的卓越贡献，激励广大中青年医务人员学习前辈的创业与治学精神，并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我们的医学成就，我们拟系统地组织编写一套能概括反映我国现代名医在治学、科研、临床等方面有卓著成就的系列传记书。本书以20世纪在我国具有第一流水平、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的医学名人为列传对象。

在成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卫生部有关领导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及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市卫生局提供的资料最多，对我们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名医名单是编委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决定的。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地欢迎各界人士继续向我们提供名医线索，以便将来列入续集中。

本书传略按年代顺序编排，分一、二、三册陆续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有的名医逝世多年，或后期侨居海外），一时难以成稿的，我们将在续集中陆续编辑出版。由于水平有限、编纂仓促，不妥之处定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1986年12月

目 录

牛惠霖	牛恩美	(1)
朱恒璧	周怀梧 方瑞英	(7)
牛惠生		(16)
高镜朗	陈家洲	(23)
侯宝璋	侯健存	(29)
薛 愚	宋之琪	(34)
傅连璋	傅维康	(40)
谷镜汧	谷伯起	(47)
胡正详	余铭鹏 丁 濂	(54)
汤飞凡	刘隽湘	(59)
张孝騫	余光明	(66)
蔡 翹	张绍溥	(72)
孟继懋	王澍寰 冯传汉	(80)
陈翠贞	刘湘云	(86)
王淑贞	张惜阴	(94)
谢志光	郭广柏 肖宫惠	(100)
侯祥川	顾 范	(108)
陈耀真	周文炳	(114)
卢惠霖	刘笑春	(119)
钟惠澜	陈绪豪	(126)
李瑞林	赵亚南	(133)
林巧稚	吴崇其	(139)
姚永政	魏德祥 周世康	(145)
邝安堃	陈家伦 陈名道	(150)

杨铭鼎	陈秉衡 (157)
魏 曦	傅杰青 (165)
余 瀛	邓公平 (171)
冯兰洲	姚青山 (181)
朱宪彝	王兴民 (187)
金显宅	左家禄 (198)
施锡恩	苏 斐 (204)
郭秉宽	王国民 (210)
王叔咸	李惠薪 (216)
张昌绍	史伊凡 (223)
吴执中	丁茂柏 (230)
黄家驷	徐乐天 (236)
朱鹤年	路长林 林葆城 (243)
汪绍训	李松年 (249)
黄克维	罗 毅 王鲁宁 (253)
赵以成	薛庆澄 (258)
朱贵卿	俞桑丽 (263)
许殿乙	李炎唐 周柏铭 (270)
熊汝成	缪廷杰 (275)
黄铭新	江绍基 曾民德 (281)
潘世宸	刘笑春 (286)
邵象伊	陶守业 (293)
马海德	田 森 (300)
李月云	彭廉媛 王弘士 (307)
顾绥岳	许良中 (312)
宋儒耀	陈国璋 (317)
裘法祖	夏穗生 (326)
曾宪九	朱 预 (333)
蔡宏道	陆定中 (339)
陈福鑫	天 竹 (344)

董淑芬.....	唐耀明 (350)
陈景云.....	王继芳 (358)

牛 惠 霖

(1889—1937)

牛 恩 美

凡是知道他的人，无不称颂他的医术。他那回春妙手曾治愈了多少人的沉痾痼疾，使他们恢复了健康。然而他自己，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889年，牛惠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牛尚周是清政府第一批送往美国留学的工程师，母亲倪氏是一名教员，和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母亲为同胞姐妹。牛惠霖在家是长子，从小聪颖好学。1907年初，18岁的牛惠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获最高荣誉的吉弗利奖。当年，在父母的鼓励和大支持下，即往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由于学费昂贵，牛惠霖进行了勤工俭学。他一边到银行充当职员，一边刻苦读书，他勤奋好学的精神，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4年，牛惠霖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共获内科学学士外科学硕士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等学位，并领有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开业证书，旋即担任伦敦内外耳鼻各科门诊主任医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医生应征奔赴前线，牛惠霖担任了伦敦叶普斯区医院重伤兵主任医师。1916年他又转任伦敦密它瑟斯重伤兵外科手术主任。他在英国行医六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灾难。作为一个医生，他竭尽所能挽救了大量被战争驱往死亡边缘的英国人民的生命。他的医术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欧战结束后，牛惠霖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上海仁济医院

院长戴文波特立即请他担任该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1924年由于过度劳累，他便辞职改任该院外科顾问医师。当时英国驻港总督病重，电请本国政府派最好的医生前往诊治。英国卫生部复电通知：去请上海的牛惠霖博士。牛惠霖对病人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从而做出了正确的诊断。以他精湛的医术使病人的沉痾得到了良好的治疗，那位总督对此感激不尽，整个香港也为之轰动，连那里的中国居民也感到自豪。

1920年起，牛惠霖应病家之请，在上海自设霖生医院，并分别在南京路利济药房和成都路延安路口设诊所，以方便病人就诊。1922年至1927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聘请他为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兼红十字会时疫医院院长及西藏路时疫医院院长。

1923年9月1日，日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关东平原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火灾和海啸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浩劫，使400多万人受灾，15万人罹难。日本红十字会向各国红十字会发出紧急呼救，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响应。牛惠霖迅速地组织了赴日救护队，亲自带队前往救援。地震使繁荣的关东平原化为废墟，到处断瓦残垣，遍野痛苦呻吟。面对怵目惊心的灾情，救护队工作困难万端。日本政府只拨给一间房屋作为中国医生的诊所，一切供给都自行解决。幸好中国救护队除医生外，还配备了男女护士、事务员、炊事员、工友和翻译，同时也带去了大量药品，其中包括许多十分昂贵的药品，都是牛惠霖等医生捐助的。救护队抵日后，立即开展工作。他们不分昼夜，不辞辛劳，抢救了一个又一个灾民，并且还免费给药……。救灾结束之后，日本红十字会给救护队的中国医生以崇高的荣誉：邀请他们加入日本红十字会，并赠予日本红十字会纪念勋章。对于以牛惠霖为队长的中国救护队的工作，日本《大正震灾史》中留下了这样的纪录：“中国为最近之邻邦，具有同类文字，国际关系也颇密切，故对我们遭受之灾害，不以为是旁人之事，给予我们最大的同情。”

牛惠霖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了痛苦，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声誉，由于他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于是许多病人怀着感恩的心情，

送来金匾银盾，盛赞他的医术。

如果说，这些金匾银盾从某一侧面反映了牛惠霖在医学上的业绩的话，那末，在与他共事过的同事和朋友那里，至今仍能听到他为广大劳动人民救死扶伤的动人事迹。作为一个正直的医生，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悉心治疗。对贫苦的病人，他一般只收两角挂号费，有时连这两角也不收。一次，牛夫人到诊所去，看见门房在叫一辆黄包车，不由感到奇怪。门房告诉她，有一个病人病情严重，但又无钱医治，牛医生把挂号费退给了病人，精心治疗后，并免费送药。知道他住得远，行走困难，还特地叫黄包车送他回家。门房最后还告诉牛夫人，象这样的事在牛医生的诊所里屡见不鲜。

1927年10月，牛惠霖医生在他的诊所里接待了一位不平常的病人。原来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革命家陈赓大将。陈赓同志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左腿负重伤，经过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上海，党了解到牛惠霖政治思想倾向进步，一向同情革命，为人正直忠厚，就帮助陈赓住进了牛惠霖的医院。一开始，牛医生怀疑将军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腿是在盗窃时摔坏的，不很乐意医治。然而，当牛医生明白真相后，深受感动，对陈赓十分友好，遂将此事告诉了宋庆龄先生。宋先生闻讯后十分关切，当即叮嘱牛惠霖及其弟牛惠生，一定要把陈赓将军的腿治好，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南昌起义部队来的伤病员。从此，牛惠霖大夫极其认真地给陈赓同志治疗，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陈赓同志是9月1日在江西南昌战斗中受的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进军途中虽经接骨但接歪了，又经两个来月辗转流亡，颠沛奔波，伤势恶化。按照他的病情，通常只好截肢完事，但他坚决反对截肢。牛惠霖和牛惠生两位医生满足了他的愿望，重新给他接起，把这条腿救下来，保住了多处受伤的残肢，得以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战了30多年。这对于陈将军来说，乃是无比的幸福。如果没有两位牛医生的高超医术，后果真是难以想象。因此，陈赓将军对他们非常感激，甚至

在很久以后，每每提及仍赞不绝口。

牛惠霖与宋庆龄既是表兄妹，又是知己好友。宋庆龄的革命思想对这位表兄的影响很大。凡是宋庆龄托他照顾的病人，他无不悉心为之治疗。对革命者，更是加意照料。有几次，牛医生回家向妻子要便服，原来他的医院里有共产党人出院，为了掩护给他们换了服装。有时，他还送给路费，以便让他们踏上征途。对宋庆龄，他更是关怀备至。宋一旦生病，他都亲自负责治疗。1936年的一天，宋庆龄腹部突然绞痛，牛惠霖匆匆赶来，检查后确诊为阑尾炎，随即请了他认为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外国医生为宋庆龄动手术，手术后，牛医生又守护在她床旁，精心照料。宋庆龄很是感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常常向秘书提到牛惠霖的名字，在给一位亲戚的信中，还特地提到她患阑尾炎时牛惠霖精心照料的动人情景。

1931年，日寇攻打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领导下奋起抗敌。牛惠霖、牛惠生和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组织救护，在上海、苏州等地设立伤兵医院，牛惠霖任上海地方协会救护伤兵第一医院院长、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军医长。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救护经验。所以在救护上海军民时，成绩显著。

牛惠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医生，既擅长外科，又熟谙内科、肺科、妇产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等。1934年2月，他曾以其高超的医术，果断而又小心翼翼地将一位病人两只离位的眼球送回眼眶。由于经受了严重的创伤，手术后病人处于昏迷状态，牛医生采取了应急措施。除了嘱咐护士精心护理之外，他本人也一天几次巡视病情变化，悉心治疗。两个月后，病人终于保住了眼睛，痊愈出院。

还有一次，一位双目失明的病人前来求医。牛医生同样以其高超的医术，给他找出了病因，动了手术。术后头几天，牛医生甚至半夜一、两点钟还去看望病人的病情变化，隔一天或几天亲自来换药，以便更准确地观察病情。在牛医生精心治疗下，病人

从双目失明到重见光明。

牛惠霖乐施好善，乞丐都愿意找他。在他的医院前总有一些乞丐聚在那里，名义上是替大夫看汽车，实际上呢，是等他周济。门诊一结束，他便将每人两角的挂号费分给他们。

他为人热心，凡有所求，他必尽力而为之。他曾资助朋友的孩子留学，也曾帮助工人的子女上学。在他医院工作过多年的董文英幼年患过伤寒，又受过惊吓，身体一直不好，卧床不起。她在中山护校肄业后，父亲十分忧虑，将女儿送到牛医生处，他即留董文英在医院，让她安心养病。几个月后恢复了健康，董父又来求牛医生，因为他的女儿护校未毕业且又大病初愈，职业难找。牛医生慨然将董文英留下，培养她学习各种护救技术，使她成为一名出色的护士。

平时，牛惠霖对他的助手们十分关心。他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而且更关心他们在业务上的成长。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凡学历不够者，他就让他们上学。平时在技术方面，他又注意帮助他们提高，以学得过硬的本领。在工作中，他对助手的要求十分严格，决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他始终支持青年学习。他本人也兼任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达十余年。经他教授过的学生，有很多都成了名医。

牛惠霖还曾被聘为国民党政府一些部、院的医事顾问，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第三任会长。对于医学会会务，筹划甚多，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呕心沥血，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柱石。

他日夜辛劳，无法定时吃饭、睡觉。常常坐在汽车上吃点心充饥。困了，则喝一点白兰地提提神，常常是午夜时分才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作为一名医生，他以治病救人为最大乐事。不仅如此，他还从自己辛勤劳动的报酬中取出很可观的一部分来，用于慈善事业帮助平民。1935年4月，牛医生的母亲70大寿，牛惠霖和弟弟妹妹们特捐巨款，在上海马桥创办慈惠养老院，收容贫苦老人。

1937年，牛惠霖医生终于积劳成疾，患上肝病，数月未能应

诊；再加上其弟牛惠生病逝后痛悼手足，病益加剧；更因抗战失利，忧愤感伤，于11月20日溘然长逝，终年仅49岁。噩耗传出，医学界为之震动，同声哀叹。

牛惠霖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发出了耀眼夺目的光彩。他曾给多少人重新点燃了生命之火。现在谁也无法估算他曾看过多少病人，仅仅肿瘤，他就摘下了好几百颗。这些恶魔都被他浸泡在医院的一口大水缸里，犹如所罗门的瓶子一样。如果他不是如此遽然早逝的话，那末，他的大水缸里还会装入更多的肿瘤，使之不得肆虐。假若他不是匆匆地离开了人世，也许他会将自己的医术通过文字而流传于世，从而发出更绚烂的光彩。他去得确实太早了，以致他去了好些年后，还不时有病人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赶来找他。

（任亚芬 殷玉良整理）

朱 恒 璧

(1890—)

周怀梧 方瑞英



朱恒璧教授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上海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创办者之一，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前任系主任。现任浙江省科委顾问、省九三学社顾问、省药学会名誉理事长、省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药理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朱恒璧 1890 年 5 月 28 日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父亲朱善夫依靠做早烟生意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不时要受到土豪的欺侮，生活十分清苦。朱恒璧少年时求学，几经挫折，终于在 1912 年考取大清红十字会医学校（后改名为中国哈佛医学校，属美国哈佛大学管辖），教师都是外国人，他们都用英语讲课，这对朱恒璧来说困难很大。原来他的英语基础差，可是他孜孜不倦日以继夜地学习英语。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赶了上去。由于他勤奋学习，1916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医学校。

1916 年，朱恒璧毕业于中国哈佛医学校，后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当住院医师。从此，开始踏上了为中华医学事业贡献聪明才智的征途。他认为医生的天职就是把病人的病治好，正如学生的责任就是把功课学好。作为一个年青医生，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疾病面前，他感到未知数是那么多，准确诊断是那么难，自己的病理学知识是那么的不够用。强烈的职业责任感驱使他争取出国深造。两年后，他终于获得了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病理学一年的机会。

1919 年，朱恒璧从美国进修结束回国后，由协和医学院院长

格林介绍他到长沙湘雅医学院教病理学。他既当教师，又当医生。在临床与教学实践中，他掌握了更多的病理学知识和经验，他的诊断水平明显提高。可是，他感到要当好一个内科医师，不但要善于鉴别诊断，而且还要善于用药。他决定再次争取出国，进修药理学。当时由于他有超人的才干，工作又出色，深受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器重，被提升为教务主任。

1923年，他获准到美国西奈大学学习。在著名药理学家苏尔曼教授的指导下进修药理学，并研究离子对心脏的影响。

在两年进修期间，他遵照导师拟定的计划，废寝忘食地钻研。在严寒的冬天，有一次他做甲鱼心脏实验，自早至晚连续观察、记录甲鱼心脏的搏动。如果甲鱼心脏不停止跳动，他就不能离开实验室。结果两天两夜才把实验做完。苏尔曼教授激动地赞扬他：“你是不知疲倦的人”。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苏尔曼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朱恒璧终于攻克了预定的研究课题，先后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更重要的是，他抓紧两年的进修时间系统地钻研了药理学，使他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药理学家之一。1925年他重新返回湘雅医学院后，被提升为药理学副教授。

1929年颜福庆约同朱恒璧一起到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工作，颜为院长，朱为教务主任。

当时，中国有两个医学会，一为“博医会”，系英国人所办，会员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总部设在济南；另一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全是中国人，会长为伍连德，总部设在上海。博医会中的外国人看不起中华医学会。朱恒璧是中华医学会会员，对博医会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甚为反感，他想：“这是在中国，不是在英国，你们神气什么呢？”于是他找上海骨科医院院长牛惠生商量，要设法取消博医会。

有一天，朱恒璧见到博医会负责人麦克斯威尔，用试探的口气说：“中国同时存在两个医学会这不大好，我们两家合作吧！”麦克斯威尔听后果便心中有数了，讥讽地说：“你要吞掉博医会是不

容易的，即使吞下去也消化不了！”两家无法谈拢。朱恒璧义愤填膺，不辞辛苦到处奔走，积极进行说服博医会的活动，不向他们办的刊物投稿，不交纳会费。如此竭力抵制了三年，博医会终于感到日暮途穷，大势已去。麦克斯威尔只得让步，并对朱恒璧说：

“两个医学会怎么合并，现在可以谈谈了。你们到济南总部来谈吧！”

1931年，朱恒璧与牛惠生到了济南，与麦克斯威尔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他们在会上提出取消博医会，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医学会”，外国人也可以参加，但会长、总干事和会计不能由外国人担任。麦克斯威尔无奈只好签字同意。

一个统一的由中国医学界人士自己掌握的全国医学学术团体将要诞生了！这个消息不但震动了全国医学界，而且在港澳同胞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牛惠生提出中华医学会该有一个会所，作为活动的中心。朱恒璧等人一致赞成，后来就计划买下上海池浜路41号的楼房。这座房子的卖价是三万六千两银子，必须先付定洋三千两。钱从哪里来呢？经过几次商议，决定牛惠生、朱恒璧、伍连德三人每人付一千两，先把房子买下来，再押给银行，然后向银行贷款，把房钱付清。留下的难题，通过召开中华医学会成立大会，发动募捐来解决。

1932年秋，中华医学会借雷士德研究院开成立大会，会议由牛惠生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海外同胞约400人。大家扬眉吐气，精神振奋，热烈祝贺中华医学会成立。朱恒璧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中国一切医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积极参加，爱护和支持中国人自己的中华医学会。大家推选牛惠生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为总干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医学院院址被日寇占领。当时，颜福庆到汉口国民政府就任卫生署长，朱恒璧便接任院长职务。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带领上海医学院师生先迁校到昆明，后来又应卫生署的要求，再迁重庆。上医刚到重庆时，只得暂借卫生署的房子住。当时，陈立夫

为教育部长，由于朱恒璧并非他的嫡系，便不给上医拨款建校舍，只给一点教育维持费。朱恒璧为筹划建院经费煞费苦心，一筹莫展。后来，他向美国助华会办公室主任郑宝南反映了上医的困境。该会同意援助上海医学院建造校舍。于是，上医校舍便在重庆歌乐山兴建起来了。

上医在重庆声誉与日俱增。并接受了中央医院和中央护士学校作为临床实习和培养护理人员的基地。为了培养人材，朱恒璧通过各种渠道聘请国内外医学专家担任教授和内、外、妇、儿各科主任。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冯德培全家流落到重庆，朱恒璧就把他请来，特地为他建宿舍，并对他说：“您不论教学与否，我们照顾您直到抗战胜利。”这样，冯德培就在上医任生理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中央研究院，推荐另一位生理学家徐丰彦教授接替他。

日寇侵入中国的同时，也占领了香港。香港大学医学院有30多名华侨学生，逃难到了重庆。他们无依无靠，流落街头，生活极端困难。朱恒璧就把这些华侨学生收入上医，并与上医学生一视同仁，免费让他们吃、住、学习。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让他们返回香港。后来这件事被英国驻华大使知道了，大使特地登门向朱恒璧致谢，并派了英国妇产科专家、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王国栋来上医任教。

抗战胜利后，上医从重庆迁回上海。朱恒璧呕心沥血、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办好上医，培养出一批批高水平的医药人材。我国医药学界的学术专家，不少是原来上医的教师或学生，如药理学家张昌绍、张毅、周廷冲，流行病学家苏德隆，内科学家陶寿淇，外科学家石美鑫，微生物学家魏曦等等；先后担任医学院院长职务的，就有六位是经过上医培养的。1980年，在朱恒璧诞辰90周年之际，原上医学生，现任上海耳鼻喉医院院长的吴学愚夫妇，热情洋溢地手书了“临江仙”词一首，专程从上海送到朱教授家里，词中写道：“兴学行医多乐事，培桃育李芳菲……”，表达了他们对朱老的敬爱之情。

回顾上医的办学经验，朱恒璧认为主要有三条：第一，聘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任教。他坚信“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认为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材的质量，首先要看这个学校教师的质量。他主持上医工作时，重视利用各种机会充实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但更关心罗致人材。上医在重庆时，就聘请了象冯德培这样杰出的专家任教。从重庆回上海后，虽然不缺眼科、X光科教师，但朱恒璧仍然非常欢迎德国留学回国的眼科专家郭秉宽，协和医院X光科医生荣独山等人来上医任教。当时上医有一部分教师和毕业生认为这样做会“反客为主”，表示反对。朱恒璧严肃批评了这种“门户之见”坚决予以抵制。

第二，切实加强基础课的教学。他说：“根深叶茂，源远流则流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比世界上任何机器都要高级得多，复杂得多。因此，从事医学事业的人材非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及医学基础不行。”在上医，高等数学一直列为必修课。朱恒璧经常向数学、物理教师了解情况，督促他们要好好地教。即使在上医迁到重庆，办学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特意买了一套物理仪器，聘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授周同庆来上课。正是由于上医学生的基础好，所以他们留学的名额总是最多，到了国外也能够真正把学问学到手。

第三，从院长到教师都要以身作则。学院设有教务委员会，各学科主任都参加，讨论决定学生的录取、升留级、退学以及课程的安排等有关教学大事，任何人不得徇私情。有一年，朱恒璧的小儿子报考上医，成绩不合格，他没有徇私，让儿子去燕京大学补习一年后，第二年才考进上医读书。为了保证教师能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他严格禁止上医的教师擅自外出兼课，更不许挂牌行医。有几个教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就是因为打着上医教授的招牌开设私人诊所，而被解聘。

1953年，朱恒璧被调到浙江省卫生厅任技正，两年后转到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任药理学教授，后又担任药学系系主任工作。从此，他专心钻研现代科学，探讨现代科学与医学的

关系。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信息论、控制论、电子计算机，还是药理学、肿瘤学、免疫学、蛋白质化学，……他见到好书就买，如饥似渴地学，兴致勃勃地与各种专业的科技人员开展热烈讨论。他始终认为，数理化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是现代医学不可缺少的基础。解放以后，不少医学院校不开设高等数学课，不重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一搞运动就削弱，甚至完全砍掉，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一再呼吁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要下决心补习数理化。

“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朱恒璧却从年近古稀的高龄开始温习数学，钻研高等数学对医学发展的作用。1959年，他在《浙医学报》上发表了“高等数学在医学上应用的我见”的长篇论文连载，对我国医药学界启发很大，影响很深。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两次派人来访，要他把这篇论文整理、补充成书，供大家学习。不幸的是，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这部书稿即将付印之际，遭遇“十年内乱”，人被揪斗，稿被冷落，此书终未问世。

朱恒璧是我国最早的药理学家之一，曾著有《药理学》一书。早在1927年他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时，就被陈克恢发现麻黄素所激动，认识到研究中药大有可为。40年代，他曾研究闹羊花的药理作用，论文在中国生理学杂志发表后，曾被摘要转载在美国的药理学杂志上。到浙医工作后，他首次为学生开设生物统计课，并指导年青教师进行了“淡竹叶退热作用的研究”。在研究抗血吸虫药物的体内过程中，他利用数学方法处理研究结果，深感数学方法是药理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60年代，他钻研关于药理作用机制的受体学说，探讨统计力学、量子力学、量子生物化学在药理学中应用的可能性。在国内首先提出药理学与数学有非常密切的量的关系。1963年，他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药理学中量的问题”一文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生理科学学术会议上宣读，一开头就精辟指出：“药理学中的许多问题，如药物的吸收、分布、排泄和代谢，药物的作用机制，药物中毒的处理，药物剂量的调整，